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人类理解研究

[英] 休谟 著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人类理解研究

[英] 休谟 著

关文运 译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理解研究/(英)休谟著;关文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

ISBN 978-7-100-08512-0

I. ①人… II. ①休…②关… III. ①社会人类学
IV. ①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887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

人类理解研究

[英] 休谟 著

关文运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512-0

2011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5 1/4

定价: 18.00 元

Hume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1953

本书据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 1953 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译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

“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



“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译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1年3月



目 录

休谟自传.....	1
第一章 各派哲学	10
第二章 观念的起源	21
第三章 观念的联络	27
第四章 关于理解作用的一些怀疑	29
第一节	29
第二节	35
第五章 关于这些怀疑的一种怀疑主义的解决法	44
第一节	44
第二节	51
第六章 可然性	60
第七章 “必然联系”的观念	63
第一节	63
第二节	76
第八章 自由和必然	82
第一节	82
第二节	97
第九章 动物的理性.....	105



第十章 神迹·····	110
第一节·····	110
第二节·····	116
第十一章 特殊的天意和来世的状况·····	132
第十二章 怀疑哲学·····	148
第一节·····	148
第二节·····	154
第三节·····	159



休谟自传

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得太多了，总是免不了有追求虚荣之嫌，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我擅自来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不过这篇叙述文字所包含的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别的；而且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的。此外，我的大部分著作的初次成功也并不是为虚荣的对象。

我是在 1711 年旧历 4 月 26 日（译者按：18 世纪旧历比新历早 11 天）在爱丁堡出生的。我的家世不论在父系方面或母系方面都是名门。我父亲的家属是何谟伯爵，或休谟伯爵家属的一支；至于我的祖先们，则历代以来曾经领有过我兄弟所领有的那些产业。我的母亲是发尔康诺爵士的女儿（发尔康诺是民事最高法院的院长），她的兄弟曾世袭了赫尔克顿勋爵的名号。

不过我的家属并不是富裕的；而且我在兄弟行中既是最小的，所以按照我们乡土的习俗，我的遗产自然是微乎其微的。我父亲算是一个有天才的人，当我还是婴孩时，他就死了。他留下我和一个长兄，一个姊妹，让我母亲来照管我们。我母亲是一位特别有德行的人，她虽然年轻而且美丽，可是她仍能尽全力于教养子女。我受过普通一般的教育，成绩颇佳。在很早的时候，我就被爱好文学



的热情所支配,这种热情是我一生的主要情感,而且是我的快乐的无尽宝藏。我因为好学、沉静而勤勉,所以众人都想,法律才是我的适当的行业。不过除了哲学和一般学问的钻研而外,我对任何东西都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嫌恶。因此,当他们以为我正在披阅屋埃特(Voet)和维尼乌斯(Vinnius)的时候,我实际在暗中是贪读西塞罗(Cicero)和维琪尔(Virgil)诸位作家。

不过我的微薄的家资实在不适宜于这种生活的安排,而且我的健康也因为勤勉用功的原故,略为衰弱了,因而我就有意(或者说被迫)来略为试试身手,以求进入一个较活动的生涯中。在1734年,我曾带了几封介绍信到卜鲁斯陶去找几位驰名的商人。不过几个月后,我就觉得那种生涯完全不合我的脾胃。我于是到了法兰西,打算在乡下隐居,从事研读。我在那里就奠定了我生的大计,那个大计我一直不懈地追求下去,结果也算符了所望。我那时决意力求节省,以弥补资产的不足,以维持我的独立生活。除了在文学中培养我的才能,我并且决心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可鄙弃的。

在我隐居法国时(最初在罗姆,不过大部分却在安如郡的拉福来舍),我就写了我的《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在法国舒适地过了3年之后,我就在1737年返回伦敦,在1738年末,印行了我的《人性论》,于是我就立刻去看望我母亲和我的长兄。我的长兄住在他的乡下故居,很贤明地努力增加他的家产进益,颇为成功。

任何文学的企图都不及我的《人性论》那样不幸。它从机器中一生出来就死了,它无声无臭的,甚至在热狂者中也不曾刺激起一



次怨言来。不过我的天性原是愉快的、乐观的，所以在受了打击之后不久就恢复了常态，而且在乡间热烈地从事研读。在1742年我在爱丁堡印行了我的《论说》的第一部分。这部著作颇受人欢迎，所以不久我就完全忘了从前的挫折。我和我的母亲及长兄继续待在乡间，并且在那时候，重新温习希腊文——这在我幼年是十分忽略了的。

在1745年，我接到安南戴尔侯爵的一封信，请我到英格兰和他一块住去。我后来知道那位青年贵族的朋友和家属，都愿意让他受我的照顾和指导，因为他的心理和健康的情况都需要如此做。我和他在一块待了12个月。我在那个时期中的任务把我的少量的资产大为增益了。此后我就又受了圣克莱尔将军的邀请，伴他并给他的远征团当秘书。那个远征团本来打算要去加拿大，但是结果却侵入了法国的海岸。又一年(1747)，那位将军到维也纳和杜林的宫廷，去做军事使节。他邀请我伴他去，仍然做秘书。我于是穿着一个武官的制服，以副官资格被介绍到那些宫廷里；和我同去的有埃尔斯金爵士和陆军大尉格伦特——即现在的格伦特将军。我一生中只在这两年中间中断了我的读书生活。我那时日子过得很舒服，而且往来的也都是上流人。我因为有这个官职，并且力事节省，所以就能达到在我认为是可以独立为生的一种资产——虽然我在这样说时，我的大多数朋友们多爱笑我。总而言之，我在此时差不多拥有了1,000镑。

我一向总想，我在印行了《人性论》之后，所以遭了失败，多半由于叙述的不当，而不完全是由于意见的不妥，而且我之仓卒付印，乃是最鲁莽的一件事。因此，我就把那部书的第一部分重新改



写了,写出《人类理解研究》来。这部新书是当我在杜林时出版的。不过这部书在一开始比《人性论》也并不怎么成功。在我由意大利归来以后,我看到全英国都对米德列顿博士(Dr. Middleton)的《自由研究》(Free Enquiry)发生了热狂,但是我的作品却完全被人忽略了。这是使我大为丧气的。我早先在伦敦所印的那些道德的和政治的论文,到此时我又重新印出来,不过也并不受人欢迎。

我的天性的中和力量,使这些失意事对我几乎不留什么印象。我在1749年回家去,和我的长兄在他的乡舍中住了两年,因为我的母亲在此时已经去世了。我在那里写了我的《论说》的第二部分,给它起名为《政治论》(Political Discourses);此外又写了《道德原则研究》(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这是我重新改写过的《人性论》的另一部分。在这时候,我的书商米拉尔通知我说,我先前的出版物(除了那个不幸的《人性论》)已经逐渐成为谈论的资料;销行的数目也逐渐多起来,而且社会还需要再版。牧师们和主教们的答复一年中有了两三次,而且我根据渥尔伯顿(Dr. Warburton)的嘲骂,看到那些书在有体面的人们中间也逐渐被重视起来。但是我曾下了决心,不答复任何人,而且我这种决心也算维持到底。我的脾气既不易发怒,所以我就容易摆脱开一切文字的争论。这些可以表示我声誉鹊起的征候,很鼓励了我,因为我一向看事物总爱看乐观的一面,而不爱看悲观的一面。我想一个人有了这种心境,比生在每年有万镑收入的家里,还要幸福。

在1751年我从乡下搬到城市——正是文人的真正舞台。在1752年,我曾一度住在爱丁堡,在那里印行了我的《政治论》。在我的作品中,只有这一种是在出版之初就成功的。在国内和国外,



人们都很欢迎它。同年又在伦敦印行了《道德原则研究》，这部书在我看来（我自然是不该自行判断的），在我的一切著作中（不论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是无双的。但是它出版以后，却没人注意，没人理会。

1752年，苏格兰辩护士协会（Faculty of Advocates）选我为他们的图书馆员，这个职务给我的薪俸很少，不过它却使我可以任意利用一个大图书馆。于是我就拟了一个计划，来写一部《英国史》。不过要继续叙述1,700年的时期，想起来就令人害怕，所以我就从斯屠渥特家的那位起首；我以为在那个时候，政党的播是弄非，颠倒黑白，才初次出现了。我承认，我当时对于此书的成功，颇抱乐观。我曾想，历史家而能把现世的权力、利益和权威，以及一般成见的呼声，都弃而不顾的，只有我一个人；而且历史这个题材既然适合于任何才干，所以我也期望得到相当的赞赏。不过我受的挫折却也太可怜。人们都攻击我，向我发出责斥、非难甚至厌恶的呼声来。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民权党、王党、教会中人、各派中人、自由思想者、宗教家、爱国者、宫廷中人，都一致愤怒我这个人，因为我擅敢对查利一世和斯特洛浦伯爵的命运，洒一掬同情之泪。当他们的怒潮的狂澜过去以后，更令人丧气的，乃是那部书似乎已被世人置之度外了。米拉尔先生告我说，在一年之内，他只卖了四十五部书。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我实在也不曾听说有一个显贵或文豪能容忍我的书。不过英格兰大主教海林博士和爱尔兰大主教斯顿博士却似乎是两个凤毛麟角的例外。这两位主教曾经分别传言给我，嘱我不要气馁。

不过我不得不说，我终究气馁了。当时若不是因为法国和英



国发生战争，而我一定退休到法国的几个省市去，变换姓名，再不回到我的故乡。不过这个计划在当时既然不甚合乎实际，而且以后的卷帙也大有进步，所以我又决心鼓起勇气，努力精进。

在此时期，我在伦敦印行了我的《宗教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以及别的一些小书。它虽发表于世，却是无声无臭，只有虎尔德博士(Dr. Hurd)写了一个短册来攻击它，它的小册富有渥尔伯顿学派(Warburtonian School)所特有的征候：偏狭、急躁、粗暴、漫骂。这个小册颇有几分安慰了我的著作在别方面所受的冷淡待遇。

1756年，在第一册出版之后两年，我的《英国史》的第二册又出版了，这一册包括了由查理一世之死到革命时期的那一段。这次作品却没有引起民权党人那样的不快乐，而且也比前一册较受人欢迎。它不仅把它自己的地位提高，而且间接地使它的不幸的兄弟也抬起头来。

不过我虽然凭经验知道，民权党有权力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赏赐一切位置，可是我仍然不愿意屈服于他们那种无意义的喧嚷，所以我在前两个斯屠渥特朝代方面，虽然因为继续研读和沉思的结果，使我改动了百余处，可是我所改动的地方总是偏向着王党一方面的。真的，要认为那时以前的英国宪法是一个拥护自由的正式方案，那是很可笑的。

在1759年，我印行了我的屠陶家(Tudor)的历史。人们对这一部书所吐露的喧声，也差不多等于对前两个斯屠渥特的历史所表示的。伊丽莎白朝代史是特别令人生厌的。不过我这时候对于一般愚人的印象，是处之泰然的。因而我仍在爱丁堡的隐遁处恬



然自足地完成《英国史》的较早的一部分。书共两卷，我在 1761 年把它出版，所得到的只有一点勉强说得过去的成功。

不过我的著作虽然遭受了这样狂风暴雨，可是它们仍然进行得很顺利，因而书商所给我的版税竟然大大超过了英国向来所有的版税。因此，我不只成了经济独立的，而且成了富裕的。我于是退休到苏格兰故乡，决意不再出世；那时因为自己不曾拜谒过一个伟人，甚至也不曾邀好于任何权贵，所以自己颇为自得，并愿借隐居把这种自得之乐维持下去。现在我既然五十转了弯，所以自己打算在这种哲学的生涯中度过自己的余生。不过在 1763 年时，我却接到素昧平生的海尔浦(Herford)伯爵的招请，让我陪他到巴黎赴任大使，而且他允许我不久就可以任命为使馆秘书；同时，我实际上执行的也是秘书之职。这个建议虽然富有引诱力，我在起初却辞谢了。一则因为我不乐意和权贵打交道，二则因为我恐怕巴黎的礼让文雅、繁华都丽的社会，也不宜于我这样年纪和性格的人。不过那位伯爵既然再度敦请，所以我就接受了他的提议。就快乐讲，就利益讲，我和那位贵族相处，是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后来和他的兄弟康威将军(General Conway)相处，也是很幸福的。

人们如果没有见过风尚的奇特之力，那他们永不会想象我在巴黎从各种阶级各种地位的男男女女受到什么款待。我愈回避他们那过度的礼让谦恭，他们愈对我表示礼让谦恭。不过在巴黎住，也能得到一种真正的满意，因为那个城中富有聪明、睿智而文雅的人们，那是全世界任何地方所不及的。我有一度还打算终身定居在那里。

我以后就被任命为使馆秘书。在 1765 年夏天，海尔浦伯爵离



开了我，因为他已经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我做了代理公使，一直等雷池门(Richmond)公爵到那一年底来到以后才罢。在1766年初，我离开巴黎，夏天又到了爱丁堡，我去那里的意思仍和先前一样，仍是打算让自己隐居在一个哲学的隐遁处。我返回那个地方时，比我离开它的时候，虽然不能说是更为豪富了，可是因为海尔浦的友谊，我却有了较多的钱，较大的进款。那时我正打算试试，多余的家资会发生什么结果，一如我在先前试验我的小康时那样。但是在1767年，我又接到康威先生的邀请，让我做次官去。因为那位先生的人格和我同海尔浦伯爵的关系，使我不能辞去那种的邀请。后来我返回爱丁堡，很是富裕(因为我每年有1,000镑的收入)、健壮，而且虽然年迈，还希望久享清福，并看着自己声名日起。

在1775年春天，我患了肠胃症，那种症候在一开始并不曾使我惊恐，不过我想它嗣后却成了致命的、无法治疗的病症。现在我料想死亡是很快的了。我倒没有因为我的疾病受了什么痛苦；更奇怪的是，我的身体虽然很衰了，可是我的精神从没有一刻消沉。因此，假若我要指出我一生中哪一个时期，是我愿意重来过一次的话，我一定会挑出这后一个时期来。我的研读仍如一向那样热烈，我的谈笑仍如一向那样快活。而且我想，一个人已经到了65岁，就是死了，也只是截去不多几年患疾的光景。而且我虽然看到，有许多征象，预示我的文名终究会显耀起来，可是我知道我也只有不多几年来享受它。我到此时对于生命算是最无牵挂的了。

现在我可以回顾一下我的性格，结束此文。我的为人，或者宁可说，我前时的为人(因为我现在说到自己时，应该用这种过去说法；这样一来，倒使我鼓起勇气来，吐露自己的意见)，和平而能自



制,坦白而又和蔼,愉快而善与人亲昵,最不易发生仇恨,而且一切感情都是十分中和的。我虽是最爱文名,可是这种得势的情感也并不曾使我辛酸,虽然我也遭遇过几度挫折。青年人和不自检束的人也乐与我相处,正如勤恳的人和致力文艺的人乐与我相处似的。我因为与谦抑的女子相处,觉得特别快乐,所以她们待我也很好,使我没有不满意的方面。总而言之,许多人虽然在别的方面都超卓,可是也往往遇到人的诽谤,致使自己不悦。至于我,则不曾被诽谤的毒齿所啮、所触。我虽然置身于各政党和各教派的狂怒之下,可是因为我对他们平素的忿怨处之泰然,他们反似乎失掉了武器。我的朋友们从来没有遇见任何机会,来给我的品格和行为的某些地方辩护。热狂的信徒们非不愿意捏造并传播不利于我的故事,但是他们从来找不出令人可以有几分相信的事实来。我并不是说,我对我自己所写的这种安葬演说中没有任何虚荣心在内,不过我希望,我这种虚荣心并没有错置了。这是一件容易弄明,容易稽查的事实。

1776年4月18日

